

閱存 /

美國外交官真相

亞細亞 亞細亞



中華書局印行



2 026 2098 5

相真官交外國美

備魚小于 著圖卡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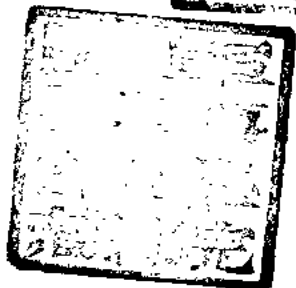


軍事學院圖書館

書號 _____

登錄號 - 05510

年 月 日入館



美國外交官真相

• 權 • 版 • 有 •
印 行 中 外 社
北 平 西 長 安 街 甲 二 三

著 者	布 卡 爾
譯 者	于 小 魚

1949.6. (初)

目次

前言	一
第一章 我做的事務工作	四
第二章 美國國務院上層的反蘇派	一三
第三章 莫斯科之行	三八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情報活動	五八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與美國的宣傳	七〇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商	八九
第七章 爲什麼美國統治者懼武揚威？	一〇〇
第八章 我對於蘇聯的印象	一〇八
譯後記	一一四

前 言

過去的一年引起了我生活上不少巨大的變化。我是一個在美國生長的美國人，我愛我的國家，並且曾經誠摯而忘我地爲它服務過，可是，在過去這一年中我終於決定永久在蘇聯居住，雖然我在蘇聯只生活了兩年，我已經很了解而且很愛這國家了。如果認爲這決定在我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是錯誤的。我對於鼓勵以及反對我探行這個步驟的各種因素作過長久而熱切的考慮。因此我的決定採納贊同我的因素是有着若干深刻的理由的。

有些不友誼的人們將從我私生活中去探究我的動機，可是，除了真理，什麼也都不是的。它們實在是純然客觀的。我作下我的決定，是因爲我已確信美國的統治者們正引導美國，以至於整個世界走向一場可怕的災難。

我得到這個信念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並不是那些倡言和平的組織與個人所發表的演詞與小冊子的結果。它是我在過去將近三年之間，在華府國務院與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觀

自所接觸與日常工作的結果。在華盛頓與莫斯科，我看到這些爲美國外交政策負責的美國外交官們如何一步步竭力設法招致世界的災禍。他們的政策現在是而且一向是反對蘇聯的；而按我的了解，蘇聯則曾經而且現在也仍舊在消除他們這種反對世界和平，反對全人類求更快樂與更美好的生活的那種破壞性的努力。

這些美國外交官們一向重視着下列這個事實，即阻止美國億萬富翁們統治世界的是蘇聯。因此污蔑蘇聯有侵略企圖，並作爲自己準備反蘇戰爭的理由，正是他們當前的目的。因爲，在我爲國務院與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期間，我已確信兩者的高級首長們的努力都爲着這個目的。

事情很明顯，我在默不出聲，盲目地推行國務院與蘇京美國大使館各戰販們的命令，從而令自己對世界人民担負一部分巨大的責任，與發出反對他們這種可怖的活動之間，遭逢着一種進退兩難的局面。要在大使館內作一種抗議，那正同在荒野內呼喊。因此，採行一個更有效的步驟是必需的。這步驟在於令我獲得有效地參與反對戰販鬥爭的機會。爲了做到這一點必須拋棄所有個人的與感情的考慮。我終於就這麼做的。

我向大使館辭了職，而且決定留在蘇聯了，在蘇聯我將竭我能力所及，參與爲和平與世界繁榮的努力。

這本書是我與若干個人廣泛接觸的結果，這些人也就是美國人民所希望能與所有國家，

包括在與法西斯致命危險作戰中爲人類作過無價貢獻的蘇聯在內，維持並發展善鄰關係的人們。可是我在國務院與蘇京美國大使館內所目擊的活動，正好與美國人民的期望形成彰明昭著的對照。我看到達摩克利斯（Lamachus）註：達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國教長狄奧尼休斯的侍從之一。有一次他誇張他自己的幸福。狄奧尼休斯便盜筮請他，同時在他頭上用一根頭髮懸了一把鋒利的大刀。）的大刀正垂懸在人類的頭頂，刀口正在逐漸下降，再度威脅着成千百萬的人民。

因此我不能緘默。

第一章 我做的情報工作

我生於賓夕文尼亞州匹茨堡附近的一個大家庭。我的父母像匹茨堡區的許多人一樣，都是來到美洲尋求較好生活的歐洲移民，他們會聽到說美洲是一塊擁有財富，自由與良好機會的土地。

像其他到美洲的移民一樣，我的雙親立即發覺他們實在是被「輸入」來給人剝削的。他們是一些名爲「廉價勞工」的貨品，而且被購買他們的勞力的僱主們待遇得像其他工業原料，像在美國煤鐵業中心用來煉鋼的鐵苗與煤一樣。

移民中有不少曾因不堪可怕的剝削與混亂而死亡，有些比較幸運的就回到了歐洲。另外許多人就畢生充任勞工，往往弄到苦極而死。我的雙親終算靠巨大的出力而活命，而且幸虧家裏有不少人做工，在匹茨堡附近一個田莊上維持了一個最簡陋的局面。

我從中學畢業以後，決心不顧所有困難，去受高等教育。當時並沒有供給學生的政府獎金制度，因此當我進匹茨堡大學時，爲了償付生活費與學費，必須做一部分的工。正像美國

大學內大部分學生一樣，我爲了維持生活，在全部入學時間內，都一直被迫工作着。經過極頂困苦而無定的過度工作以及憂慮能否完成學業，畢業後能否找到一個職位的四年之後，我離校找職業了。

最初我在幾個商號內找到些短期的工作，大戰期間進了美國情報局工作。後來我被派在國務院任職，大戰結束時，國務院又送我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

簡括說，這就是我的生平。這裏除了說明我是赴美的歐洲移民的成千百萬子孫之一，一億四千萬具有許多方面相同背景與經歷的普通美國人之一外，並無重要意義。

在美國家庭，中小學，大學，紐約與華盛頓工作場合所接觸的廣大人群中間，我發現沒有一個人他們的出身與當前的生活中，沒有困難與不遭受損害的。

歐洲人對於美國人生活的普通概念離事實極遠，他們似乎認爲美國人每人都生活在經濟安定與對將來有信心的情況下，美國的青年人人生來都是有照顧與快樂的。

我只有在華盛頓國務院與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期間，才接觸到了上層階級與在受高度庇護的優裕生活中長大的青年，僅少數例外。可是他們與真正美國人生活之間的距離正像我們與其他地球上的人們一樣遙遠。他們與作爲國民大部分的我們相比，實在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自然，我雖然幾乎有生以來就生活在樸實的境況中，可是我在各方面都比同世代的大部

分年青人幸運。我不像不少朋友與熟識者，他們早年就離開學校，在匹茨堡的煤礦，煉鋼廠，店舖與工廠內工作，而且今天大半依舊在那些礦場，工場，店舖與工廠內，我終於設法受到了高等教育，並獲得了『高尙的』工作。

離開大學之後，我有時在私營的商號內工作，可是這種工作完全不能令我滿意。我發了一個竭盡我的能力參與反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的大希望。就在那時候，我得到一個美國空軍大隊情報部裏的職位，我接受了它。

在這個組織裏，我一度在北大西洋組工作，不久以後調任戰略服務局（OCS）外籍股的職位，該局是美國主要的情報機關。

我的主要任務是仔細研究在美國出版的外國報紙與期刊，特別是斯拉夫文的出版物。我該寫一些在美國各斯拉夫團體，特別是一些進步的團體的活動的綜合評論與報告。我被希冀着在這些報告內，作一些如何利用這些團體，以完成戰略服務局情報任務的建議。

當時我認爲我在美國情報機關內的工作，對反對全人類的敵人希特勒主義是真正有用的。我生來憤恨法西斯主義，我認爲在情報機關的工作，將是與法西斯禍害戰鬥的最好方法。以後，我發覺了，至少我抱這種理想主義的思想是非常天真的。如所周知，大戰時期美國的情報機關對與法西斯作戰一事並不賣力，而戰後它們採行着一種與德義日以前與現在的一些法西斯情報與反間機關全力合作的政策。

在戰略服務局任職期間，我終於熟悉了美國人稱以『外套與短劍』外號的這個情報機關的歷史，任務，工作方法與方式的一些有趣的詳情。

戰略服務局的主官是鄧努萬（William Donovan）將軍。他於一八八三年生於紐約州的布法羅地方，曾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參與德境美國遠征軍的騎兵隊。鄧努萬是個天主教徒，共和黨人，一九三二年曾充紐約州長一職競選失敗的候選人。

從戰略服務局工作一開始的時候，鄧努萬就設法獲得美國政府的信任。他憑着非常狡猾的活動，終於使華爾街的反動勢力對於這個機關也施用到了他們的權勢。

他的所以能這麼做，是由於羅斯福其時忙於有關美國作戰努力的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的緣故，鄧努萬會因此親自委任了一些他那情報機關裏的上層人員。

鄧努萬會邀請了一些他的商場同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同伍的退伍軍人，担任主要的行政職位。舉例說，勃克斯登上校（G. B. Baxton），一九一九年鄧努萬與他會為美國的法西斯組織『美國參戰軍人團』（American Legion）作過奠基的工作；巨大的進出口公司『夏威夷波羅公司』總經理李却嗣（Atherton Richards）；摩根（J. S. Morgan），『幸福』雜誌的羅伯（Elmo Roper），第一次世界大戰『英雄』與華爾街的律師李佛摩（R. Livermore）等。鄧努萬還邀了邱吉爾的一位表兄弟蓋斯特（Raymond Guest），百萬富翁雷昂（

子 Ryan) 之子，反動的『紐約太陽報』老板狄華特 (Bill Dewart)，梅隆豪門後裔保羅·梅隆，及前沙俄王子與將軍奧波倫斯基 (Sergei Obolensky) 參與戰略服務局工作。奧在參加戰略服務局以前，生活十分狼狽。

鄧努萬在創立戰略服務局之後不久，就派出了他的代表到海外去搜集各國關於經濟情況與政策的情報，其中不少以報紙通訊員的身份出國。

法國覆敗後，鄧努萬曾訪問法國，設法判明它潰敗的原因。

鄧返美後，就自信地向美國政府報告，法國的失敗並非由於『第五縱隊』，也不像如同布立特大使所報告的由於法國共產黨的活動，而是由於窳劣的軍事領導以及法國對於現代戰爭的全無準備。

以後鄧努萬訪問了巴爾幹各國與中東。他也訪問了倫敦，開羅，雅典，貝爾格勒特，索非亞，安哥拉與耶魯撒冷。他作這次旅行是爲了爲美國軍界搜集特別情報，並視察在這些國家內美國各情報機關的工作。

鄧努萬在阿爾及爾時，曾與魏剛將軍作過一次長時間的商討，因而完全熟悉了北非的情勢。因此事實上早在一九四〇年底，美國已經開始了他們在北非的軍事行動的準備，甚至在那時候已經通過美國情報機關建立了與北非法國軍事當局的聯繫。

在一九四二年九月，鄧努萬會與簡稱 W 的英國經濟作戰情報處的首長，在倫敦作過

一次關於在軸心國家與軸心佔領地區散佈秘密宣傳材料的商談。當時對於宣傳的部署達成了一個協議，這宣傳旨在使在這些國家的親盟國分子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但同時不准他們在有利於美英的時日以前發動對德人的暴動。在這些談判中，被佔領國家人民的利益是最少受注意的事情。

戰略服務局有鑒於歐洲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憤恨，它與這些國家的地下抵抗團體建立了聯系，在這些組織裏滲入了它自己的特務，以便美國情報機關在戰後利用它們。

幾個月以前，美國情報機關送給法西斯西班牙的反間機關一張二次大戰期間在法國參加反德抵抗運動的西班牙人的名單，這事令我吃驚異常。美國以這樣的方法報償這些游擊戰士給予的協助，真令我感到巨大的羞耻。

我在戰略服務局內工作很快就發覺了這機關主要的情報活動，並非對付德國，而却是對付蘇聯的。

我根據我許多的觀察，可以明確地說，大戰時期美國情報機關的首長們會利用美蘇之間存在的盟國關係，派遣職業的情報官員滲入了蘇聯境內，進行反對這個盟國的情報工作。這些情報官員會以各種僞裝派往蘇聯，例如充顧問，二三等秘書，參贊以及大使館書記，充當軍事供應使節團與軍事參贊辦事處官員與僱員，還有假充美國報紙、雜誌與廣播公司的廣播員，或担任租借設備裝配工作的專家。

美國情報機關活動的反蘇方針已由下列事實證實：在美英聯盟反對法西斯德國的大戰期間，戰略服務局內最大的部門是俄羅斯司，它由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羅賓森主持，他在美國被認為偉大的蘇聯問題專家。

俄羅斯司內設有專事搜集關於蘇聯工業與軍事生產量，運輸，人力，國民收入，對外貿易，農業等情報的組。

戰略服務局一開始就認為反蘇的情報工作最為重要。大戰將結束時，戰略服務局認為搜集關於蘇聯及其外交政策的情報，關於對蘇友善的各民主國家的情報最具重要意義。

我確實知道戰略服務局駐倫敦的代表們，曾與英國希臘與比利時的情報官員結有密切關係，他們並且徵僱供給情報的特務，這些情報不僅是關於敵人的，也有關於盟國的，而其中特別以蘇聯為主。

舉例說，戰略服務局駐重慶的代表們就搜集關於蘇聯的情報，一九四二年戰略服務局的一位特派員白衛軍俄人L·托爾斯泰曾被派往西藏，研究毗連蘇聯的地區，並在這些地區策劃反蘇的情報活動。戰略服務局的人員會由伊斯坦堡派遣特務前往德國與蘇聯。

在有些有利於美國統帥部的情況之下，戰略服務局的人員曾在德國佔領的地區策動擾亂，而在次數更多的別的情況之下，他們有意地阻礙抵抗運動的發展，並使它導入於對美國戰略上有利的途徑。我確實知道戰略服務局在進兵歐洲日以前曾故意阻礙法國抵抗運動的暴動

。另外在暹羅，抵抗運動的領袖們已作了發動反對日本佔領軍的大暴動的一切必要的準備，但在暹的美國人員也採取了類似的態度。

戰略服務局會由自動入伍的新兵中組織若干別動隊，在許多情況之下，這些小隊在歐洲被佔國家與北非做得好像是抵抗運動的『組織者』，實際上他們在那裏創設一些反動的地下組織。他們搜集情報材料，並積極參與反對人民陣線的游擊隊，特別是法國共產黨的鬥爭。他們專門支援鼓高樂的地下組織，就是毫無疑問地推行所有美國人的命令的。

因此戰略服務局不僅在德軍戰線之後搜集情報，而且在歐洲各淪陷區打擊進步勢力。類似的別動隊在日本也竭力攻擊進步的勢力。

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在美國留學而最受信任的暹羅學生中，會被選出一些新兵，他們被送入戰略服務局所設的特種情報訓練班，教以無線電通訊，破壞，與游擊戰爭的戰術。後來這一群人通過秘密的途徑，進入暹羅，並設法滲入抵抗運動的統帥部，奪取它的控制權。這做法使這一群人利用抵抗運動，完全爲了推行美國情報機關的命令。

大戰期間，美國政府與蔣介石會訂有一個特別的協定，此後就有一個中美的情報機關在中國創辦起來，這機關叫『中美合作社』，該社的活動是受美國戰略服務局指揮的。

歐國情報官員們會獲得蔣介石政府充分的合作，一個美國海軍部的文告會說起，兩國情報機關如此密切合作，歷史上尚無先例。

我可以證明下列事實，即兩情報機關的這種合作一直延續到現在，美國情報機關至今利用着中國情報機關進行其反對蘇維埃遠東的工作。

我在大使館工作期間，知道莫斯科中國大使館的情報官員，正是在蘇工作的美國情報官員們的出力助手。

因此我們看到了那個原來爲了有意義的對德戰爭而創設的情報機關，如何在戰略服務局反動的首腦鄧努萬，以及他那些華爾街的朋友們領導之下，變成了反動的巢穴，它致力於訓練反蘇的情報以及其他秘密工作的人員。在戰略服務局人員活動的一些國家內，它總受着那些最反動的分子的支持，他們對蘇聯，進步與民主正抱着同等程度的仇恨。

大戰期間，鄧努萬及美國其他情報機關的首領，都把盟國與蘇聯的關係當作一種純粹的形式，必要而並非誠懇的。他們企圖利用其時蘇聯人民遭逢的艱難與困苦。他們會不耐地等待蘇聯的削弱，希望大戰之後，他們能迫使這個大國屈膝，可是他們是痛苦地失望了。

雖然如此，他們的失敗並沒有令他們受到什麼教訓，他們現在還存有這一期望。顯然他們並沒有從希特勒與法西斯德國造成的教訓中得到什麼益處。

第二章 國務院上層的反蘇派

美國政府各方面都很清楚，特別是美國駐蘇大使館的人們很清楚，蘇美之間的事務幾乎是一小群美國職業外交官專有的財物。

自從一九三三年美國大使館在莫斯科設立以來，這一群人，或者說這一派，設法在國務院內佔有了起決定作用的發言權。自然，他們也必須與不屬於他們一類的一些國務卿與駐蘇大使們商量商量。

可是這些『蘇美外交的獨佔者們』對國務院與美國駐蘇大使館的人事安排具有完全的控制。除極少幾個時期外，他們一向能在所有各個主要問題上施行其反蘇的方針，只有一些較小的事件才有例外。

特別是現在，這一派仗仗密切的友誼關係，以及更重要的互相便於私利的關係強固地聯結在一起，它佔有整個外交部門與國務院的重要職位。

這個『美蘇外交獨佔集團』的職員們又以相同的政治看法而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他們都